

湘籍史学

家研究



湖湘文化研究丛书

周谷城传

莫志斌 著

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周谷城传

莫志斌 著

责任编辑：黄林艾莲

责任校对：曾常红

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长沙市岳麓山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32开 12印张 300千字

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00册

ISBN7—81031—523—4/K·029

定价：12.00元（平）；20.00元（精）

251001

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及 湖湘文化的再度辉煌

《湘籍史学家研究丛书》序

麻天祥

中国社会，王朝更迭，频繁相代。学术思想，不因帝王将相的浮沉而改变它的发展方向。入清以来，学术中心自中原向东南转移，并流入湖湘之间。船山以下，人才辈出，魏源、唐鉴、曾国藩、王闿运、毛泽东，把湖湘文化推向中国历史的大舞台，也把中国社会、中国学术思想的格局搅得天翻地覆。实在可以说是“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。历经道、咸，直到民国的湘潭王闿运曾经说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……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矣哉……孔子以为难者，我皆教之”，亦可见湘人踌躇满志的心态。有人曾说，近代学术由湘入蜀，后由蜀入粤，再由粤北上而遍及大江南北。此话正确与否，姑且不论，但由此足见湖湘学术在近代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正是在这块丰饶的文化厚土上，才孕育出湖湘学子刺天、回天、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和精神风貌。当代有许多德、才、识三长兼备的历史学家，如周谷城，翦伯赞、吕振羽、杨树达、向达、刘大年、黎澍、李剑农、张舜徽等，皆由三湘四水之间走向全国。湘人在近代史上的骄傲，湘人对中国学术的贡献，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然而，湖湘人才辈出以及湖湘文化的辉煌，也只是近代的历史。湖南自古为卑湿之地，北阻江湖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山道崎岖，食货两艰，苗蛮杂萃，人文少及，历来为流囚、遣客栖息之所。周秦汉唐近两千年中，北国东土已成诗书之邦，潇湘依然天荒之地。诚如善化皮鹿门所云，“湖南人物罕见史传，三国时如蒋琬者，只一、二人。唐开科三百年，长沙刘蛻始举进士，时谓之破天荒。”（皮锡瑞《师伏堂未刊日记》）宋元以降，中原乃至江淮学术南走江湖，湖湘学派兴起，三湘人物始崭露头角，然盛名遍及宇内，学术思想影响全局者，仍寥寥无几，与他省相比，依然瞠乎其後，因而有所谓“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，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。”（杨毓麟《新湖南》之二）孰知道、咸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豪贤峻起，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，历经道咸经世、同光中兴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护国战争，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，湖湘子弟接踵而至。其业绩之丰，勋功之著，令举世瞩目。故有人赞之曰：“清季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功业之盛，举世无出其右。”（谭其骧《中国内地移民史·湖南篇》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近代中国事变日亟，三湘士人之胸怀亦愈张扩，由过去“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”的庸碌，而为“救中国请自湖南始”的自许，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。叱咤风云的湖南子弟，又使边陲蛮荒的三湘四水，一跃而居“天下之中”，“系十七省人心之希望”（《二十世纪之湖南》），于是而有人惊呼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”！

屈子、贾谊伤心之地，何以一变而为群英荟萃的人才渊藪？对此或以为“湘运之兴，从湘军起”；或视为移民对湖南族源和血缘更新的结果；更有人认为，这是湖湘文化以及船山学说的流行和哺育。其实，湘运之兴，可以远溯南宋，近代湖湘人文鼎盛则是中国学术中心转移所孕育出来的辉煌。

湘省学术，曾有人远迹屈子，近接濂溪，“一为文学之鼻祖，一为理学之开山，万流景仰，人伦模楷，风声所树，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！”（钱基博《湖南近百年学风》）可是，屈原楚人，非生于湘土，仅因流放而行吟沅湘；周敦颐虽隶籍道州，却宦游外省，筑室匡庐，乡邦受惠实鲜，流风尽在河洛。故周秦汉唐直至赵宋前期，湘中虽间出一二文人雅士，名流贤达则多为他乡谪客。此间湖湘实无学术可言。时至北宋末年，福建崇安胡安国及其子胡宏避居衡岳，创碧泉书院，著书讲学，“远邦朋至，近地风从”。胡氏兼采《春秋》三传，断以己意，并以性本体论的“性学”与中原学术相呼应，“卒开湖湘之学统”，时称绍兴诸儒“莫出五峰之上”（《宋元学案·五峰学案》）。继以胡宏高足，四川广汉人张殷主讲岳麓，以天、性、心“同体异取”的命题对胡氏学说加以阐扬，而且敦笃躬行，发明天理，见诸人性，使湖湘学术愈见精粹，除湘籍学侣而外，川、赣、闽、粤、浙、苏、皖各省，“四方学者争向往之”，受业门人近千人。朱熹也不殚其劳，两次率徒由闽入湘，问学论道，相得益彰。其他如吕祖谦、陈傅良也多与张殷相往还。一时之间，潇湘荆蛮，竟有南国洙泗之誉。无怪《宋元学案》赞之曰：“湖南一派，当时为最盛。”（《南轩学案》）

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，虽崇尚心性，却又最重践履，“教人以圣贤语言见之行事，因行事复求之圣贤言语”（《宋元学案·南轩学案》）。其治学心忧天下，用世匡扶时艰，故“南轩子弟多留意经济之学”，因而成功立业，载诸史册者，比比皆是。仅其一传弟子具名事迹者 33 人，《宋史》诸书著录称扬者 23 人。其中功名显赫者，则有被誉为“湖湘学者第一”的胡大时，以节概见称死谥忠肃的彭龟年，定边安邦、讲明理学、清慎廉洁、以循吏称著四海的游九言、游九功兄弟，“负用世才，遇事迎刃而解”的陈琦，上书力主抗金、官至刑部尚书的赵方等。其中湘籍英豪贤士，还

有醴陵吴猎，邵武赵善佐，湘潭钟如愚，以及湘乡周爽、萧佐，零陵吴伦、蒋复，常宁王居仁，祁阳谢用宾等，黄宗羲誉之为“岳麓巨子”而与朱学相比肩，并专设《岳麓诸儒学案》，以彰湖南学风（《宋元学案·岳麓诸儒学案》、《湘学略·岳麓学略》）。显而易见，湖南士子载诸史册之日，正是湖湘学术兴起之时。而构成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才群体的，恰恰大多是湖湘学派的门人弟子。学术兴而人才出，应当说是历史和逻辑的结论！

元、明两代，湖南人才一度蛰伏。及明末清初，衡阳王夫之，身经国变，目睹时艰，肩负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学术责任，遁迹荒山，发愤著述，综核百家，进退宋儒，卒能自立宗主，光启湘学。“洞庭之南，天地元气，圣贤学脉，仅此一线耳”（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）。湖南学术之能绵延弘扬，实有赖于船山“坐集千古之智”，对传统思想的继往开来。然而，王夫之以抗清为职志，甚遭清廷忌嫌，其著作屡被禁毁，加之其厉操幽栖，高情避世，故其学说也未得流布，湘籍名士载诸史册者亦属罕见。不过，清初数百年间，湖湘学术仍不绝如缕，时至嘉、道之间，又有贺长龄、贺熙龄、劳崇光、陶澍等脱颖而出，官至督抚。他们无论宦游外省，还是归籍居养，无不锐意经世，力兴文教，终致湖南学风日进日新，湖湘学术勃然而盛。其尤可述者有三：

一曰湘水校经堂的设立。道光年间，湘抚吴荣光、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、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，共创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院内，舍制艺帖括而以经史实学课士。凡讲、试、批阅均由两山长主持，一矫书院陋习，造就了又一批三湘士子。如王先谦所说：“湘水校经堂于省城之旧城南书院拔取高材肄业其中，一时造就人才，如周自庵侍郎、郭筠仙侍郎昆弟、孙芝房侍读、凌葭舟中翰，号称极盛。”（《虚受堂书札》卷二）《纪世文五编·书院》也说：“咸丰同治之际，中兴将相，什九湖湘。闻岳麓山长某公，

自道光建元，即以气节、经济、文章立教，奇杰之士，咸出门墙。”这样，继陶、贺之后，又涌现出曾、左、胡、郭等风云人物，湖南又一个人才群体在清室的衰微中蔚然而起。

二曰今文经学入湘。近代今文经学源出常州，邵阳魏源从刘逢禄受业，以《公羊》义而注《诗》《书》，以经术而求治术，又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。湘人有评之者曰：“二百年来，大江南北，相率为繁琐之经说，而邵阳魏源默深治今文尚书、三家诗，门庭敞然。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，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，而建立一帜。道咸之间，举世以谈洋务为耻，而默深首治之。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，近接魏氏，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，能发人之所未见，冒不韪而不惜。”（《新湖南》）故湖南洋务人才与维新志士，无不受今文经学的熏陶。

三曰船山学说之传衍。道光年间，新化邓显鹤率先刊印《船山遗书》，朱道然继立船山书院，宣讲夫子之学，不遗余力。嗣后，曾氏兄弟再次辑印《遗书》，船山学说乃大行于世，三湘士子，获益殊深。无论中兴将相、维新志士，还是攘夷排满的革命党、师夷长技的洋务派，尤其是志在恢弘民气，重塑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学界巨子，无不私淑其人，嗜读其书，诸如彭玉麟、王湘绮、皮锡瑞、郭嵩焘、欧阳中鹄、谭嗣同、唐才常等，不胜枚举，使船山学说不胫而走，把湖湘学术推向时代的峰巅。近代学者杨树达指出：“自船山先生以后，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，因欲保持自己的民族，故感觉外患最敏，吸收外来文化最力，而在全国为最先。如魏默深之志海图，郭嵩焘、曾吉刚之赞西化，光绪丁酉、戊戌之办新政，皆其例也。”（《积微翁回忆录》）乃至“船山之说大振，不数年而清室亡。”（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第一集）

上述三者，尤其是今文经学入湘、船山学术流行，而使湖湘文化光耀中华，完成了学术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。近代湖南人才

迭起，实在是嘉道以来湘学兴盛的结果。同时还要看到，湖湘学术不仅以经世务实为特征，而且也特别重视心性之说。自胡宏的性本体，张殷天、性、心同体异取，上接二程之理，下启陆、王之心，直至曾国藩、刘蓉、郭嵩焘倡汉宋兼容之理学于洞庭之滨，湘水之侧，亦视心性为根本。可见，湘学实为传统学术之集萃。以毛泽东为首的民族民主革命斗士和共和国的缔造者，正是在三湘四水之间接受了兼容心性、经济之学的洗礼，走向中国的历史大舞台，并以此孕育的人文精神，扭转乾坤的。他们是湖湘学术造就的第三个人才群体，也是湖湘文化登峰造极的鼎盛阶段。当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著名的湘籍史学家，他们对文化传承所作的贡献，对历史进步的召唤，都表明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，湖湘文化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
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文科基地建立之日，丁笃本君建议组织撰写《湘籍史学家研究丛书》，委我为主编。位尊无功，而为之序。

1996年11月
序于桔园坡

《湖湘文化研究丛书》列入

“九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

“九五”国家教委重点图书选题

目 录

序	(1)
第一章 故乡、家世、少年时代 (1898~1917)	(1)
一、来仪湖的传说	(1)
二、故乡的风光	(2)
三、周氏家族的迁延	(5)
四、“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	(8)
五、“我的天性喜欢接受新事物”	(9)
六、“立异鸣高”的高材生	(10)
七、“莫错过了暑假”	(13)
第二章 “五四”前后 (1917~1920)	(15)
一、考入北京高师	(15)
二、“运动”与读书	(17)
三、读书与写作	(21)
四、发起“阶级问题辩论会”	(22)
五、驱赶白兰美	(25)
第三章 投身大革命 (1920~1927)	(27)
一、结识毛泽东	(27)
二、“伦理学”新释	(31)
三、《生活系统》——思想奠基之作	(34)
四、“阶级斗争没有中立的余地”	(43)
五、南下广州	(45)
六、投身农运	(46)

七、离开武汉	(48)
第四章 流亡上海 (1927~1930)	(52)
一、胡适作难	(52)
二、译书卖文	(53)
三、“中国之教育”新论	(56)
四、著《中国教育小史》	(66)
第五章 在广州中山大学 (1930~1932)	(67)
一、播革命“火种”	(67)
二、社会史论	(68)
三、论中国的知识分子	(114)
四、研究逻辑	(130)
五、莫逆于心两共鸣	(131)
第六章 在上海暨南 (1932~1941)	(134)
一、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	(134)
二、独具特色的《中国通史》	(136)
三、探讨中国政治史	(162)
四、“孤岛”接来鸿	(171)
第七章 在重庆复旦大学 (1942~1946)	(173)
一、转道山城	(173)
二、谈“中国之现代化”	(175)
三、为“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”呐喊	(182)
四、研讨中国史学史	(193)
五、老友相逢在山城	(206)
第八章 迎接解放 (1946~1949)	(209)
一、《世界通史》之新见	(209)
二、组织“大教联”	(217)
三、抗议“临时办法”	(219)

四、“教授说话了!”	(220)
五、支持“反美抗日”	(221)
六、逮捕和信任	(223)
第九章 风雨十七年 (1950~1966)	(226)
一、努力办好新大学	(226)
二、不要轻视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	(228)
三、“形式逻辑与辩证法”的新思维	(230)
四、毛泽东支持大讨论	(239)
五、谈史学与美学	(243)
六、“我的文艺理论观”	(253)
第十章 夕照青山晚景明 (1966~1996)	(263)
一、不当“风派”人物	(263)
二、“书要让他继续写”	(264)
三、喜迎“科学的春天”	(265)
四、伟大的感召	(271)
五、论历史与爱国主义教育	(274)
六、要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	(277)
七、“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”	(282)
八、与江泽民的交往	(287)
九、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振兴中华	(289)
十、对故乡的一片深情	(296)
十一、在患病的日子里	(301)
十二、一代宗师	(304)
附：周谷城年谱简编	(308)
主要著作年表	(368)
后记	(370)

第一章 故乡、家世、少年时代(1898~1917)

展开湖南省地图，桔子洲头，湘江缓缓北去，流至约70华里的乔口（今望城县乔口镇），有条名叫乔江的支流，自益阳资江之兰溪（今益阳兰溪镇），迤迤而来，中经凤凰湖、来仪湖，自西而东，入注湘江。来仪湖畔，有个四面环水的小岛，名叫汾湖洲，这里就是周谷城的老家益阳汾湖洲。

一、来仪湖的传说

汾湖洲面对碧波荡漾的来仪湖。来仪湖系古“八百里洞庭”最南端之一湖泊。南滨著名衡岳72峰之一的碧云峰北麓，属丘陵地区，桔林茂盛，湖光山色，风景如画。

来仪湖，地处湘、资两江尾间之间，为望城、宁乡、湘阴、益阳四县接壤之区、沟通湘资两江之捷径，亦为昔日连接长沙、湘江、资江、洞庭、沅水、常德间之一重要历史航道。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记载：1855（清咸丰5）年，益阳泉交河人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，因其时湖北大片地区为太平军所占，连年兵伐，民穷财尽，胡虽为巡抚，“号令不出30里”，粮尽兵溃，困窘万分，不得不从泉交河运米济军，乃起运粮米40余船，由泉交河南下来仪湖，出洞庭，浩浩荡荡，派军押运达军营，“士卒感其诚”，这才维持了胡手下清兵于不散。

来仪湖系湘鱼类繁殖、候鸟麋集之区，春暖时节，湘、资两江鱼类，群集而来产卵，鱼虾满湖；金秋季节，湖水回落，广袤

湖洲，绿草如茵，各类候鸟，群集栖息，或觅食，或嬉游，或追逐，或歌唱，或飞翔。尤其是深秋时节，天高云淡，一行大雁，款款北来。那“嘎嘎”的雁鸣声，清脆响亮，仿佛是一曲雄浑的北歌，抒发着它们在万里征程中的无限豪情。

说到来仪湖，其间，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。

来仪湖毗邻凤凰湖，古有“凤凰来仪”之说。相传：五千年前，在一个秋高气爽，晴空万里，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轩辕氏南巡洞庭，跋涉艰辛，来到极南端之湖滨，目击湖波荡漾，百鸟麇集，悠然自得，其乐融融；绿草茵茵，绿意盎然，葱茏中绽出各种各色的不知名的野花，在清风湖韵中粲然微笑，令人感受到生命的宁静和愉快。黄帝兴致勃勃，乃令随行人员，张“钧天之乐”，只见凤凰来仪听乐，百鸟群飞，于是，“凤凰”、“来仪”，遂为湖名。

后，虞舜亦南巡而来，只见碧波粼粼，群鸟嬉戏，悠然自在；芳草萋萋，天高气爽，空气清新，水乡泽国，南国风光，美不胜收。舜亦兴高采烈，遂命随侍，“奏韶乐于此九成”。所奏乐典曰“韶”，《书·益稷》载：“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”。又载：“备乐九成，而至凤凰，其余鸟兽，不待九而舞”。凤凰乃传说中百鸟之王，羽毛美丽，雄的叫凤，雌的叫凰。凤凰来仪，为祥瑞之兆，人们希冀祥和，故呼其湖曰凤凰湖、来仪湖。曹丕《秋湖行》亦有“尧任舜禹，当复何为？百兽率舞，凤凰来仪。”由此可见，来仪湖名称之由来，历史悠久，且极富史趣诗情。

二、故乡的风光

周谷城的故乡汾湖洲，是块美丽的湖洲。汾湖洲是来仪湖区30余万亩大圈垸田的一部分。如果说来仪湖形似一不等边三角形

的话，则汾湖洲正位于其东边线上，长约 30 余华里，汾湖洲原系四方环水的敞洲。1717（清康熙 56）年开始逐年挽围，迄 1826（清道光 6）年，经劳动人民百余年的艰苦劳动，终于完成了四面皆筑堤垸的湖区水稻田垸。

汾湖洲属小型溪流伴山岗地带的河网冲积平原，地势平坦，无丘陵起伏，为第四纪松散堆积物、冲积物地带，周长近百华里，境内岭汉并列，港沟纵横，湖塘众多，原称五岭五汉，即：八甲岭，周家汉，汤家岭，汤家汉，潭家岭，陈家汉，水濠汉，荷塘岭，水交汉，宋家岭等，土地肥沃，鱼虾满塘，农作物丰富，水稻田约 3.4 万亩，素称鱼米之乡。

说到汾湖洲的美丽景色，不能不提到这里别具特色的“赏荷”。一到夏季，家家门前屋后的池塘里荷花盛开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旖旎风光，真令人陶醉。

荷是水中君子，出污泥而不染。平静的塘面，荷叶升起，像一把对天撑开的绿伞，又似一只遮阳的平面斗笠。荷花盛开之际，有的粉红，有的玉白，亭亭玉立于碧波之上，迎风婆娑，轻盈袅娜，娇美如凌波仙子。荷花往往高出荷叶，当阵阵清风吹来荷香，波动的水面使荷花与荷叶上下浮动，周围景色也不断变化，置身于这风吹荷摆的动景中，真使人情爽神怡。

汾湖洲畔的来仪湖，虽无西湖享“人间天堂”的美名，亦无昆明湖雍容华贵的丰姿，却有洞庭天水一色，烟波浩渺的壮观。秋高气爽，夕阳下，站在高高的湖堤上，眺望太阳西沉，一道道余光，照映湖面，“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无限美感便油然而生。

站在高高的湖堤上南眺，隐约可见海拔 500 多米高耸入云的衡岳 72 峰之一的碧云峰；它形似庐山，素称小庐山。

晋高僧慧远（334~416），曾建青山寺于山腰，传道授徒。

唐裴迪有颂慧远诗云：

远公遁迹庐山岭，修士幽居祇树林。
片石孤云窥色相，清池皓水照禅心。
指挥如意天花落，笑卧闲房春水深。
此外俗尘俱不染，惟予元度得相寻。

南宋张栻亦曾于此讲学，刻诗石壁云：

峰势香楼耸，溪流峡水潺。
居然一兰若，唤作小庐山。
老木千岸表，环亭万竹间。
明朝向征路，回首白云闲。

峰巅有“雷音寺”，石墙铁瓦，林谷幽深，岩壁峻峭，极目千里，无限风光，令人遐想连连。

与汾湖洲遥遥相对的泉交河镇为益阳名镇。沿河而建的吊脚楼，别具水乡市镇特色。一平面石桥，飞架泉交河东西两岸，任凭山洪冲击，岿然不动。桥东耸立一座七级奎星塔，塔基系麻石砌成，高出洪峰，故安如盘石。塔身系青砖结构，塔顶飞檐，铺盖青瓦，塔上长虬松，四时葱茏，葫芦塔尖，直插云天。

塔建于1828（清道光8）年，“奎主文章”，乃命名“奎星”，寓意深远。

塔基上刻有清泉交河探花胡达源的跋，两江总督陶澍亦有诗刻石壁云：

石塔峥嵘俯碧湾，青流交处锁重关。
陡通七级烟霞上，平引三台步履间。
卓笔恰当山料峭，振衣时听水潺湲。

胸怀久抱凌云志，抚手丹梯路共攀。

泉交河东行数里为侍郎桥，滨临来仪湖南岸。据旧志载：此桥因明、元两代有工部侍郎苏文魁（1403~1424）、姚贞清卜居此地而得名。现苏、姚两族均系附近大族。据姚氏族谱载，辛亥革命时期投黄浦江自杀以醒国人的姚宏业志士，即姚贞清之后裔。

侍郎桥东有营盘岭（又称营坡岭），相传：1130（南宋建炎4）年，岳飞攻战杨么时，曾驻兵于此。岭下有牛皋岭，则为牛皋驻兵处。

侍郎桥东行数里为欧江岔，滨来仪湖东南岸。欧江岔之猴子岭有一梅树村，村内有一宏伟的杨泗庙，为纪念南宋农民革命领袖杨泗将军。杨泗将军即杨么，湖南龙阳（今汉寿）县人，在诸农民领袖中年龄最轻，故称杨么。据《岳飞传》载：“杨么……方浮舟湖（洞庭湖）中……官舟迎之辄碎，飞伐君山木为巨筏，举木撞其舟，尽坏，么投水，牛皋擒斩之。”

杨么因拒绝投降，慷慨就义，丹心碧血，气贯长虹，为劳苦大众所敬仰。为避统治阶级之忌，隐其名而神化之，谓其斩孽龙得道，为民除害，于是建庙以祀之，名曰杨泗庙。

至于汾湖洲东出湘江的乔口，为我国著名诗人李白住过的地方。西出资江的兰溪为早在30年代即在上海名噪一时的革命作家叶紫（1910~1939）逝世的地方。这两处均有不少景观和神奇传说。

来仪湖、汾湖湖畔无限美好的风光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正是这一片沃土和优美的环境，哺育和熏陶着少年时期的周谷城。

三、周氏家族的迁延

1898年9月5日（清光绪24年7月28日），周谷城诞生于湖